

胡国华 傅上伦 冯东书 戴国强 ■ 著

告别 饥饿

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GAO BIE JIE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教育出版社

告別 飢餓

GAO BIE JI E

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胡国华 傅上伦 冯东书 戴国强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胡国华等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406-7217-1

I. 告… II. 胡… III. 农业经济-经济史-史料-中国-
现代 IV. F32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161 号

责任编辑\杨向群

责任技编\肖作勤

封面设计\陈国梁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87 000 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7217-1

定价：15.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34120440

岁月留痕

——《告别饥饿》再版前言

胡国华

我和朋友们写的《告别饥饿》一书，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即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再版。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很多，但抹去岁月的尘埃，往事却清晰依旧。这本书初版是在十年前，当时也纳入了人民出版社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选题。书的副题是“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副题道出了这本书出版之不易。这本书初稿成于1980年，距今已近三十年。因历史的原因，此书的问世真可谓一波三折，回想起来至今仍令人十分感慨。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随着时间的前行，变得面目越来越不清。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时间并不算长。但因这一阶段中国发生了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变化，缤纷万象使人们已淡忘了往日的记忆。那时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历史的破冰之旅是怎样起航的？这两个问题，对年轻一点的人已很难讲清。书刊上对当时情景的一些片段的记载与描写，甚至让有的青年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回忆有时也是靠不住的。时空会折射或阻隔记忆，使之与真实产生差距。更何况因各种原因，有的当事人也会有意或无意偏离甚至歪曲历史，让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告别饥饿》十年前出版，距写成初稿时仅十八年，但从书中我们几人分别写的回忆可以看出，大家对当时情况的记

忆，已不尽相同。当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尚且如此，那些意见分歧甚至对立者，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吗？联想到最近一些有关名誉权的官司，有些事件当事人的亲属子女硬要追究有些记者损坏当事人名誉的责任，记者竟然输了官司，不禁觉得还历史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告别饥饿》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确是当年即时留下的真实记录。这本书事先并不在计划中，它的产生纯属偶然。要明了这一点，不能不提当时的时代背景。“四人帮”以紫夺朱的岁月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最终战胜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但是要把人们的思想真正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如同冰雪消融一般，尚需假以时日。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最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饱尝“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之苦的贫困地区，率先纠正了“农业学大寨”中的极“左”做法，开始逐步落实农村政策。过去多养几只鸡鸭、多种一点瓜菜就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的做法被废止，农村集市开始兴旺。

有些地方胆大的基层干部开始怀疑“集体经济为主”的合理性，他们偷偷摸摸在村里实行“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的办法。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办法使农民的积极性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粮食产量当年就大幅度增长。但是，这种做法与当时的政策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一边做一边捏着一把汗，为了防止被发现，有的地方参与者还一起订了攻守同盟。

后来，有的媒体报道了这些地方的做法。不料却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有些人觉得，“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一直解决不了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解决吃饭问题，不妨试一试。但也有人认为，“包产到户”

是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货色，现在又当作新鲜货来推广，这还了得？一家权威的报纸发表了甘肃一位干部的来信，对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行为，是和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实质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全国很多地方的党委机关报转载了这封来信。不少地区开始明令禁止“包产到户”等复辟资本主义的做法，已经搞的也一律限期纠正。一时间如刮过了一场引发倒春寒的冷风，给中国广大农村带来了阵阵寒意。

“包产到户”到底能不能搞？搞“包产到户”是不是等同于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农村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改变现状？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良知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正是在此时，新华社总社决定抽调记者到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调查，以掌握真实情况，向中央作如实的反映。其时，我正在新华社甘肃分社当农村记者，有幸成为担当此任的记者之一。与我一起被抽调的记者还有宁夏分社的傅上伦、陕西分社的戴国强，总社的冯东书也从另一路配合调查。

临行前，总社社长穆青同志召见了我们。他开门见山地对你们说：“这次叫你们来，我是反复考虑才决定的。你们都是农村记者，能吃苦，也了解农村实际，相信能不负众望。”我们这才知道，这次采访是由他亲自部署指挥的。

接着，他有些动情地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极‘左’的农村政策，对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现在有些地方自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有人叫好，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事实到底怎样？你们要认真采访。除‘包产到户’外，你们还要广泛深入了解各种情况。一定要沉下去，到最后基层去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他最后又强调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他们当时发表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正是在他这番话的鼓励下，我们在黄土高原坚持连续采访了半年时间，跨越了四省区三十九个县上百个公社，一路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行程万里。我们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认真听取了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诉求。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写稿，陆续写了数十篇内参。这些稿件，对当时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张易公社采访时，发现这个公社一年前就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当年就实现了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事情暴露后，地委书记明确表示支持，自治区领导却坚决反对，要求尽快纠正。这使得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在内参稿中如实反映了这些情况，也谈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我们这次采访形成的稿件，大多数都是内参，公开发表的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

1981年初，我被调到北京新华总社筹办《瞭望》杂志。工作之余，我把我们写的内参修改梳理了一遍，形成了一部书稿。因在杂志社工作，与印刷厂的工人熟悉，我便请他们把这部书稿用铅字排了出来，打印了二十多份。我把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个出版社，编辑看了都说好，但

是没有一家敢出版。他们一致认为，内容太尖锐真实，在当时出版没有把握。无奈之下，我把打印稿分送给了从事农村报道与关心农村工作的朋友，我们自己也一人留了一份作纪念。

没想到，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因当年拿到书稿的一位友人的推荐，人民出版社以《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为名，出版了这本书。

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全国有数十家报刊发表或转载了书评。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都是认为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最可贵的是它的真实可信，它是作者当年深入黄土高原的全景式的实录，没有任何虚构和追忆成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对事业的忠诚，也可看到为了追求幸福理想的生活，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走过了怎样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本书在尘封十八年后终于出版，也看出了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决心和勇气。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这本书得以再版，则说明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回顾历史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在享受今日改革开放成果之时，决不能忘记，这成果是来得多么不易；人们在看到当前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时，一定要想到，与当年相比，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此书的再版能起到这样一点警醒作用，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以往努力的一种肯定。

序 言

真话的历程

杨克现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是新华社四位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那时候，我国农村正处于告别饥饿的历史关头，改革方兴，步履维艰，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书稿于我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初的1980年完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1998年面世。从成稿到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呢？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人们知道，我国几亿农民蕴藏着的创造活力无比巨大。依靠他们，方得以推翻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制度。然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四人帮”不断强化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农民讲给农业领导人听的故事。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农民们普遍敢说话了。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着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难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

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作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二

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

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以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他们是带着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工作的。没有人给他们什么红包馈赠，没有人给他们什么特殊的招待，他们也不指望荣获什么新闻特等奖、一等稿的殊荣。对于他们来说，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全凭着一腔共产党人的良知与情操，找农民，找干部，找专家；一社社，一队队，一户户，去了解至今人们讳莫如深的问题，了解农民们在解冻之初强烈的愿望和迈出改革第一步的艰难历程。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调查的成果——“内参报道”，接二连三发回北京新华总社，总社又及时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这一系列“内参报道”，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立体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为之奋斗的农民兄弟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他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

形势之严峻，不仅是党的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作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给广大干群心理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和放宽政策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的政策界限，超越了长期受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熏陶的干部所能承受的程度。失望与惋惜之余，却又有一种不甘心失败的自信。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历史事实，特别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事实，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绝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是也很有一些流传于民间、藏之于名山而被保存下来的著作，至今仍熠熠发光的么？说是这么说，记者工作年年月月都是忙碌的，特别此后的农村报道日益繁重，谁也没有余暇顾及其他。天长地久，六千多个日子过去，

大家渐渐将书稿出版之事置于脑后完全淡忘了，以至于今天重找一份完整的书稿，反而成了极大的难事。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又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内参送到中南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都极为重视，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有关此事的“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迎着风浪，力排众议，解开这多少年来解不开的死疙瘩。

农村记者相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但这部书稿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刻了，我自信我留存的那部书稿一定还在。我曾经认为，这部书稿绝无仅有，十分珍贵。回北京之后，我便开始留意书稿的踪迹。半年后，终于在一摞早该清理却尚未动手的材料堆中找到了它。翻出来看，那原先洁白

的打印稿纸，落满尘埃，已经变得又黄又脆了。

像明珠失而复得，我欣喜若狂。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当年农村生活的艰辛情况，历历如在眼前。第三天上午，我即将它推荐给一向关心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老朋友张广友和赵华甯。我向他们二人讲述了这部尘封多年的书稿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当天，张广友将书稿拿了回去，连夜看了一遍，便将它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的李春林。

我和李春林素不相识。过了两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就是李春林，已读完书稿，还希望能读到那几个尚未变成铅字的章节。从电话中，我证实了张广友的介绍，李春林是一位忠诚人民出版事业的编辑。

当我三天两头催促作者们翻箱倒柜寻找那散失的章节时，我自己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份有关黄土高原贫穷饥饿调查报告的“报告”。那是当年秋天，兰州调查交流汇报会形成的材料。为了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考察，同时还请了陕甘宁三个分社的采编主任参加。大家一起，交流和分析西北黄土高原农民贫穷饥饿状况，分析产生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讨论治穷致富的良策，以及新华社今后农村报道对策性的意见。我是这篇报告的“报告”起草者之一。因为意见来自基层实际，到现在，重读这几千字的意见稿，我仍然认为对当时的情况概括准确，分析不失中肯，意见直到现代也还切实可行。于是，顺理成章，建议将它续为书稿的最后一章。有了它，便使这次调查有始有终，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另外，还有一点要在这里证明。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同志，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三

当书稿理出点头绪的时候，李春林建议我写一篇序言，对书稿作些必要的说明。我认为，本书的价值，不必由我来讲，每位读者都有权利作出评价。我的一生只不过是新华社的农村记者。我所愿做的，是将书稿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个概括的回顾。再有，便是借此机会向读者说些心里话。

我常常认为，在战争年代，军事记者是我们行业中最辛苦的一群；在和平岁月，我们农村记者是最辛苦的一群，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这还不是说，和城市采访相比，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分散。就像当年四位记者走过的黄土高原，很多地方是“十里一村，隔山为邻”。崎岖的山路，连汽车也不能通过。为了采访的需要，农村记者什么样的路都得走，什么样的苦都得吃。也还不是说，和城市采访已经有了过细的行业的分工相比，农村报道涵盖面广。一位农村记者背个包下乡采访，经济、政治、文教、民俗，无所不包，各种知识都得齐备。还更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农村大于城市。我们的农村工作固然开初几年也有顺利的时候，但自从高级社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文革”动乱，挫折、徘徊、煎熬，乃至饥荒，总之什么样的境遇都发生过。农民的欢乐常常是农村记者的欢乐，农民的焦虑也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焦虑，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而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国家虽然任何时候都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但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有一本书叫《当代“老新闻”》，其中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写的就是做一名

讲真话的记者的苦处，以及不管讲真话有多大的风险，都应当敢于讲真话，以及讲真话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好处。作者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文章写道，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深入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